



【导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不但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衍生、发展、传承的过程中，沉淀下了深厚的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善美的蕴藏，生发出共通的价值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形成了一整套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礼仪制度，延续下来源远流长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历史意识，还有为中国人民所推崇的勤劳、节俭、自强不息和积极进取的特性，所重视的人的仁爱利人、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持身立节的品格和友爱、互助、忠贞的人际关系等等，从而创造和积累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举世无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簇独放异彩的奇葩，其中许多优秀成分不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影响，而且至今对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时期，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构成了经济与社会大发展的新的契机。同时，也由此引发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矛



盾，如：部分人的素质下降，道德观念沦丧，社会心理失衡等。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现代文明的建设。现代文明与传统是无法隔绝的，富有生机的传统对于推进社会生活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运行、发展，是一束永不熄灭的薪火，是一种连绵不绝的动力。在我们国家处在加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从党中央到学术界乃至广大群众对此课题都极为重视。

目前，学术界的任务应当是：除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一般性考证和论述外，更重要的是着力于具体阐明和论证哪些是属于积极因素，有利于促进当前改革开放，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哪些是属于消极因素，对改革开放，对当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第4页）。只有逐步理顺和讲明了这些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积极作用的论断，才会有发人深思的说服力，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笔者学识尚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涵和关系仅能做一般性论证，然后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几部明清小说为例加以具体论证和阐述。

第一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明清小说研究」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概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概念之阐释

传统，在现代意义上是英文 tradition 的音译，在我国古代，是传和统的复合词。传统之传，本义是遽，《说文解字》和《尔雅·释言》都有记载，按照郭璞《尔雅》注的解释，是指驿站上所备的车马，以便急速传递消息，这就蕴涵了一站传一站的意思，可引申为传授。像《论语·学而》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有相传继续之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传者，相传继续也。”传统之统，本义是丝的头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丝皆得其首，是为统。”引申为万有总束为一个根本，《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这里的“统”即君主嫡系或总原则、总规律、总宪章世代相承的王统、血统、道统、法统。由此可见所谓“传统”，是取“传”的相传继续和“统”的世代相承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之意。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88年版）对“传统”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①谓帝业、学说等



世代相传。《后汉书·东夷传·倭》：“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南朝梁沈约《立太子恩诏》：“守器传统，于斯为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上》：“儒主传统翼教，而硕士名贤之训附之。”②世代相传的具有一定特色的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心态、文化等社会因素。孙犁《秀露集·耕堂读书记（一）》：“从庄子到柳宗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有时也指世代相传的、旧有的。杨沫《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五章：“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我们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传统的第二层涵义，在《中国文化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中则进一步补充为：传统，指由历史沿革而传下来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传统是绵延不绝的，应用在社会制度上，即成为一种媒介，生活在一定环境下的人自小便由传统学得一些习俗和累积的知识，以及先辈的成见。一种传统的就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标准，有助于加强群体的意识和团结。

文化，是今天社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概念之一。据法国学者路易·多洛推测，如果用电子计算机对当今处于最显著地位的词或概念进行统计，“文化”一词居于首位。同时，“文化”还是一个最有争议的概念，日本学者名和太郎的统计表明，关于文化的定义多达二百六十种。时至今日，在文化研究热潮中涌现出来的文化定义据说已达一万种。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为文化下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定义，确为一个难题。在西方，文化一词由来



久远，德文写作 kultur，英文写成 culture，其源头出自拉丁文 cultura，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意思。最早给文化界定的是英国杰出人类学家、文化史和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奠基人泰勒（E. B. Tylor）（1832—1917），他先后给文化下过两个定义。1865 年，他在《人类早期历史与文化发展之研究》中谈道：“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1871 年他又在《原始文化》中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这一定义在西方学界拥有较大的权威性，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 年版）将文化概念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文明与文化》，1982 年，求实出版社，第 45 页），作为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作为狭义的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普通含义是以文教化，和武力征服相对应，即所谓“文治武功”。《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看作“文化”的原始提法，唐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文化，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他把文化看作是用来教化天下的诗书礼乐一类东西，古人往往从这个角度来谈文化。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在



《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前蜀杜光庭《贺鹤鸣化枯树再生表》：“修文化而服遐荒，耀武威而平九有”，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汉语大词典》“文化”词条，1990年版）如此等等，与近代意义上的文化词义相关，但不完全相同。梁启超于1922年12月发表的《什么是文化》一文，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一文化定义发掘国人对于文化涵义的传统理解，并采借外来词义，其研讨走向及成果受到肯定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哲学家任继愈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等。狭义的文化，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任继愈，《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岱年则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谈道：“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文化的内容即思想、学术、艺术、制度、礼俗等。”归结种种，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的文化定义，可以用《中国文化辞典》中的“文化”条目来表述：从广义上讲，文化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从狭义讲，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作用和影响其政治和经济；文化具有民族性，随着各个民族的发展而形成民族传统；文化有其历史延续性，每一个社会物质



发展的历史延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延续性的基础；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具有阶级性。

由上所述，所谓“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定义为：由历史绵延流传下来的，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现有的多元化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一种，是源头最古老、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充分的一种文化传统。它随时推移、与时俱进，每个时代对传统文化和它的某些成分都能发现新的意义并作出新的解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而又世代相继，不断丰富自己内涵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赞同范建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光明日报》，1996年9月7日，第5版）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地说，传统文化是指古代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释家、诸子百家等多种文化要素，是一个多样化的思想体系；而广义地说，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而且包括现代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不同于“五四”以前的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这里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革命的思想文化，是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优秀部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继承、更新和发扬，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党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这里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传统文化。

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当



今世界最普遍的时代主题，它构成了一条使人类大多数民族陷于其间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化，自然形成不同的流派和概念。目前对现代化问题研究较多，观点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是一批英美学者，他们多以英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状态作原型，并参照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特征，来概括现代化的内涵，他们还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视为现代化的过程模式，进行宣传 and 推崇。如丁·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冲击下，业已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一个从农业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这样一个大转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4 页）塞缪尔·P.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30 页）。C. E. 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把“现代化”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 页）我国学者罗荣渠则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指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



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6 页）这一定义比较细致和客观，基本上说明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本文也采用这一定义。

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是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也打破了中国人“天朝大国”的神话，中国人被迫面对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于是，实现现代化以摆脱屈辱和苦难的困境，成为百余年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之前仆后继的首要问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目睹时艰，倡行“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开展了“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直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不懈奋斗，力图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因为这一次次努力不断得到凸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广泛进行，世界成为一个互为相关的整体，每一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激烈竞争的网络之中。在这一网络中，落后国



家不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而且在一体化的网络交换中也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因而落后国家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压力甚至解体的危险。面对这种形势，落后国家努力摆脱贫困落后、谋求现代化和追求现代化的热望成为一股强大的浪潮，各国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能否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潮中，在谋求现代化和追求现代化的热望中，寻求到适合本国情况的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了寻求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做出积极的探索。周恩来早在 1954 年就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36 页）。后来，他在 1963 年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讲了这个问题。从下面一段讲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所提的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心思想：“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2～413 页）“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不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四个现代化”这个问题，而且概括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及具体步骤。1979 年 10 月 30 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



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在后来的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又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使“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越来越清晰。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谈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际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文选》，第282页）1983年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观点是一种崭新的全面的观点，其主旨就是在发展中谋求中国社会的富强、民主与文明。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到处看见这样的事实：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总是与这里人们的整体文化状况、文明程度相关。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应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社会客体——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逻辑起点，以文化的现代化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生动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其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是与该民族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其文化素质密切相关的。人的素质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取向和进程，可以说，民族的素质状况决定着一个民族今天的面貌和明天的前途。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雷洁琼在《人的素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文中也指出：“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快速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全国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所讲的，要把经济建设工作真正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当前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时时感到，人的素质已经成了制约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可以这样说，没有很高的民族素质，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如果现在我们再不以极大的力气提高全民素质，我们的经济建设不但不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而且已经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可能丧失。”（《光明日报》，1994年12月4日，第3版）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完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建设任务，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是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具体来说，除了向全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行现代科学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文化思潮）的教育外，作为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民族的精神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已经得到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能否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将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课题，需要认



真对待。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关系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封闭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西方文化蜂拥而入，中国文化无力抗衡，节节败退，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开始了文化上的思索。中国文化的命运如何？它将如何发展？是近百年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直到如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深化，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空前广泛，许多海内外学者就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一，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尽弃自家无尽藏，割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机联系，可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这一思想倾向，在近代史上已经出现过，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胡适和陈序经。1929年英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发行，其中收入胡适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在此篇文章中，胡适为了进一步明确他的西化主张，提出了两个词汇：一为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为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此年鉴出版后，社会学者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



论周报》上写一书评，认为前一词可译为：“全盘西化”，后一词可译为“全力现代化”或“充分现代化”，从此“全盘西化”作为一个固定含义的词汇，开始在报刊出现。严格地说，胡适的“全盘西化”只停滞在一般号召上面，并未深入论证和阐发，真正积极鼓吹者是当时的社会学者，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1934年1月，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详细论述“全盘西化”论的观点。该书对中国文化的三种前途，即“全盘西化”、“坚持复古”和“折中调和”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是：“我们的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因为第一，“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第二，“西洋的现代化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除了适应这种趋势外，只能束手待毙”。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全面模仿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连它们所产生的弊病也要接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股思潮再度泛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电视片《河殇》的解说词和被称作“文坛黑马”的刘晓波。《河殇》指出，由中国这片黄土地和黄河孕育的“黄色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封闭和保守的文化，它虽然延续了5000年，但并没有值得自豪的地方，相反，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中国人眷恋黄土地，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西方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和“黄色文明”必然是一种“失败的文明”。刘晓波则声称自己实在看不出对于今日国人来说，传统文化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在传统文化中，“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只有绝望和幻灭”。若要改变这一状



况，必须“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选择的批判》）。也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却以种种理由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陈旭麓在《传统·启蒙·中国化》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与小农经济扭结在一起的”，“它不仅无法孕育出近代工业文明，而且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精神障碍。”（《时代与思潮》第1期）有人甚至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封闭性文化”，属于“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的文化，它所“闪现的都是各种动物式的自然色彩”（《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及其时代特质》，《光明日报》，1986年5月26日）。对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德国19世纪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其著名的《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Taoism）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儒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儒学的价值功能做出否定认识，认为儒家伦理是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这种理论曾被西方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所认同。美国当代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是没有价值的。在中国，龙柏文在《儒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中谈到，以孙长江、包遵信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儒学作为已经腐朽的封建传统学说，已没有再生或转化的余地，它早在三百年前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阻力。否定儒家传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而这也是儒学没有任何前途的实践依据（《读书》，1986年第5期，第125页）。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则说：“关



切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固然表现了崇高意境，但是如果它（指儒学）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没有现实的指导和促进作用，那么提倡这种学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第9页）以上这一系列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机联系的观点，根本无视我们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创造的优秀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片面夸大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其后果只能是使中华民族失去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失去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向心力，失去进行现代化建设应有的自尊、自信；必然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导致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美化和盲目崇拜，最后走向崇洋媚外。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西方文化既不可能为全体中国人民所接受，也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另一种极端的思想倾向是竭力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把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等同起来，可称为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倾向。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引用一个外国人的话：“西方文化已经破产，还要等到中国文化来救我们，你们何必又到欧洲来找药方呢？”来说明欧洲战争已把西方资本主义偏重物质文明的弊病暴露无遗，今后唯有以中国的精神文化作本位，再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偏颇。与此同时，被看作是现代新儒家先驱的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世界文化有三种类型，欧洲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